

新文明的种子与土壤

■田松

读过建生的书稿,让我敬畏之心油然而生。书的副题是“新乡建设手记”,其实是一本“新乡建设手记”,每一位有志于乡建理论和实践的人都该读一读。

乡村建设是一个老话题,也是一个新话题。一位名牌大学的博士,毕业后不在大城市工作,跑到农村,会让人深感困惑。很多人初闻“乡建”,可能联想到支教、扶贫、慈善,乃至上山下乡。不仅外人如此,甚至有些志愿者也会有这种想法。

社会实践没有恰当的理论指导,是盲目的,有时会适得其反,以为是帮忙,其实是添乱。建生的著作中,包含了大量的理论建设。

关于为什么乡建,建生追溯到晏阳初。说实话,我是在接触到乡建之后,才开始深入了解晏阳初的。这是一位世界伟人,是一位被严重忽视的先知。

建生用了很大篇幅介绍晏阳初先生。我这里稍稍转述一下:

1926年以后,晏阳初以河北定县(今定州)为根据地,开始了史称“定县实验”的综合性社会改造。晏阳初把当时中国人的问题概括为“贫弱愚私”,并认为,其根本的解决方式在于教育。他提出以学校、社会、家庭“三大方式”,同时进行文艺教育、生计教育、卫生教育、公民教育“四大教育”。因为农村的问题不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,而是全局的问题,不能头疼医头,脚痛医脚,必须谋求综合的解决之道。(第4页)这种“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卫生连环并进的农村综合改造”(第12页),在我看来,正是一种在文明层面上上的社会改造。

鸦片战争之后,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巨变。中国这个社会存在问题,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。但是问题的根源在哪儿,有人认为是人,于是致力于“国民性改造”;有人认为是制度,于是致力于革命,推翻旧政权,建立新社会。但是,两者常常是互相牵扯的,鸡蛋,蛋生鸡。一方面,有了好的制度,制度本身会培养出好的公民。另一方面,没有“新民”,制度如何建立?即使革命成功,没有“新民”,制度如何维持?

晏阳初认为:只要大多数中国人民仍然是“聋、哑、瞎”,军阀们就会继续为非作歹。“瞎”指人民不能读书,“聋”指人民不知道国家或地方大事,“哑”指人民不敢指责和反抗压迫和腐败。(第18页)

他说:
我的观点是那些干革命的理想主义者,无论革命成败与否,最后他们注定要失望。因为即使是成功,胜利的曙光也从未照耀在他们所梦想的那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上,也未能照亮人类所有卑劣自私的阴暗角落,

而是照在了一个人们所熟悉的平庸的地方,仍然需要食品杂货店和污水处理系统。(第10页)

所以,晏阳初试图从教育入手,逐渐改造土壤、培育种子,最终改天换地。民国一代很多乡建先贤,都如胡适先生所说,“以渐进与改革的手段来实现一个极为激进的目的”(第12页)。文明的整体改造,这当然是一个激烈的目的,不过,激烈的目的也可以通过润物无声的方式。建生自述:“我之所以能从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转变为乡村建设的践行者,也是因了对教育的信仰。”(第11页)

建生的乡建理论上承民国的乡建运动,下接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,有历史深度,境界高远。

二

我们正处于一个文明转型时期,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。这话现在非常政治正确。但是,如何转,怎样转,是个问题;乃至什么是生态文明,生态文明是什么样的,也没有统一的理解。

我的工业文明批判常常被人质疑,没有给出一个可操作的方案。对此,我曾经采用尼尔·波兹曼的方式回答:作为哲学家,我只负责提供方向,不负责提供方案;但是,你不能因为我不能提出具体的方案,而否定我提出的问题。当然,我也在努力寻找方案。只不过,这些方案仍然是方向性的。所谓大业有专攻,文明转型这样的大问题,不可能由一两个人提供完整的可行的蓝图。

我接触乡建这个领域不算晚,早先是出于情感。作为农民的后代,我在农村一直生活到上小学,对于农民和农村有天然的感情,也一直通过家里的亲戚关心着农村的现状。所以李昌平对总理说实话,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共鸣。此后,我开始关注“三农”问题,了解温铁军先生的工作。再往后,与温铁军先生有了直接的接触,认识了温先生的几位高足,包括建生。

大约2005年之后,我批判的对象逐渐从科学主义扩展到工业文明。我从垃圾研究出发,得出一个很强的结论:由于垃圾问题不可解决,工业文明注定不可持续;如果不能在有限的时间,转向新的文明,人类文明将会崩溃。文明的整体转型,包括社会转型,又不仅仅是社会转型。不久前,在一次未来哲学的小型会议上,陈嘉映先生听过我和刘华杰的报告,形容我们的工作,说有一种老虎吃天的感觉,不知从何下口。这也是我最初考虑这个问题时的感觉。方方面面,千丝万缕,盘根错节,牵一发而动全身,哪儿都可以作为起点,从哪儿下手都发现难以操作。

经过几年的沉淀,与同行的交流,我慢慢地找到了两个切入点:一

个是教育,一个是农业。前者关乎社会意识,后者关乎物质基础。教育这个点容易理解,一个生态文明的社会,需要这个社会的主要成员,具有生态文明的基本观念。这需要通过教育,实现全社会缺省配置的重新建构。农业这个点可能会让人感到意外,但是很快就能想通。人总是要吃饭的,吃饭就需要农业,那么很简单,在一个工业化的农业之上,怎么可能建设起一个生态的文明!所以,生态农业是生态文明的前提和基础。从学理上,我从工业文明批判入手,转向生态文明建设,再转向生态农业建设。

但是,农业不可能脱离农民和农村而独立存在。建设生态农业,也需要重建农村、重塑农民。生态农业建设与乡村建设,就自然交会到一起了。

中国的生态农业实践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,有不同的理念,不同的思想资源。我关注较多,对我影响也比较大的有两支队伍。一个是蒋高明先生在2006年7月创办的弘毅生态农业农场;一个是温铁军先生在2008年创办的小毛驴市民农园。作为“三农”问题专家,从一开始,温铁军先生所关注的就不仅仅是农业的生产方式问题,而是着眼于农村、农民和农业三个层面。小毛驴的命名大有深意。作为温铁军先生的弟子,建生的立足点在乡建之上。建生的博士学位论文《在地化知识与互助型社区建设》,就是一篇基于乡建实践的理论工作。作为生态学家,蒋高明的思路比较明确,就是以生态的方式进行农业实践。不过,很快,蒋高明也发现,生态的农业方式,也是在具体的社会意识中进行的。蒋高明同时变身为社会学家,开展农村调查。同时,也在对农民与基础官员进行生态教育。也在不知不觉中转向了“乡建”。

于是,在我看来,乡建,就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最为恰当的可操作方案之一。

三

建生这本手记内容丰富,涉及理论、对策、操作多个层面,是一个全方位的乡建操作手册。

一个实践性的理论总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上,一个是对当下现实的判断,一个是对未来理想的预期。

在晏阳初的时代,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尚未发生。所以当下乡建所要面对的现实,要多一个生态和环境的维度。在对于未来理想的预期中,也需要多出这个维度。

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工业文明的全面冲击,中国农村的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。晏阳初当年的问题依然存在,依然贫弱愚私,依然聋哑瞎,只是换了方式,换了形式。

当下的农村现实到底是什么样的?需要我们重新理解,重新认知。

多年前,看到有个地方,全村以拐、卖孩子为生,让我难以置信。前年,又看到新闻,农村的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。一位在城里工作的孩子回到农村,问他的父亲:“你到底死不死,我只请了七天假!”让人想象不出,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。在晏阳初的时代,农村的自组织力量还在,宗法制度还在,儒家伦理还在;今天,农民在自己的家乡失去了意义,青年人从小就习惯进城打工,与土地之间不再有天然的浓郁的感情,也失去了务农的能力。

草根已经开始烂了,草根下的土壤沙化了。与此同时,农村的自然环境也发生了巨变。在很多地方,几十年的工业化农业已经把农田变成了污染源。

在另一方面,农村不再有那么多的文盲,基础教育基本普及,村村通让大多数人家都有了电视,能够与城里人同步看《新闻联播》,看电视剧。大多数青年农民也都有手机,用微信;信息流动更快,更杂。但是,农民的基本信仰是什么?农民的基本愿望是什么?这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实践,才能有所了解。

建生这一代乡建人士,所要面对的社会问题更加复杂,更加严峻。

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书里面建生本人的乡建经历和经验。他在投身乡建的过程中所亲身经历的种种事件,初闻匪夷所思,但又是当下农村的现实。不了解这些现实,就没有一个相对准确的对当下农村的判断;从外面来的志愿者,很快就会四处碰壁,不得不铩羽而归。我在康东看过一个纪录片,讲述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大学生,在联合国某组织的安排下,来到泰国乡下的中小学支教的故事。影片中,这些志愿者很快就陷入迷茫。他们只有一个关于教育的抽象理念,他们对于未来的构想,都是基于工业文明的缺省配置的。同时,他们也不了解泰国农村的具体情况。我们现在有很多热情的青年,心怀善良的理想,愿意去农村支教,其实也常常属于这种情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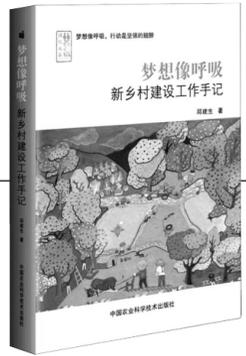
我建议这些青年在去农村之前,能够读一读建生的书,自己先受到乡建教育,再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主义。

建生在书中还有一些非常具体的经验,比如如何与乡村干部打交道,如何与农民打交道;如何建乡村图书馆,如何建乡村大学……;这些操作层面的经验对于其他的乡建人士,也会有借鉴和启发。

四

建生说:梦想像呼吸,行动是坚强的翅膀。话有诗意,很耐回味。

乡建人士大多是理想主义者,愿意为理想付出青春,付出终生。梦想



《梦想像呼吸——新乡建设手记》,邱建生著,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

阅读推广人

◎邱建生,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(海峡乡村建设学院)教师,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副秘书长,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总干事,爱故乡计划发起人,一直从事乡村建设的研究和实践。

◎该书介绍我国乡村建设的起源和发展,介绍了乡村建设思想和乡村建设哲学;介绍了农村现状与期待发展的问题,介绍了作者在乡村建设实践中的经验和实例。该书对促进农村发展,对更好理解和解决“三农”问题有建设性意义,可供参与新乡建设的实践者、研究农村发展的研究人员参考。

像呼吸,须臾不可缺。梦想赋予生活以意义,梦想就是生活本身。建生不断追问:我们要去哪儿?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?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,失去了梦想的生活,是不值得过的。但是只有梦想,没有行动,梦想就只是梦。行动是梦想的翅膀,能够让梦想飞得高,飞得远。

(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)

书话

对于生活在陆地上的人类,庞大的海洋世界自古以来是相当陌生的。由于技术条件局限,人类很长时期不能战胜狂风恶浪,自由地驰骋在大海大洋之上,更不能深入海底,潜入黑暗的海的深渊。因此我们中国人对海洋始终是充满敬畏又十分好奇,汉语中有一句很精练的语言表达了这种复杂的心态,这就是“望洋兴叹”!

但是,人类探索海洋的进取心不可阻挡,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,这种状况终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。

大型画册《海洋》(法国萨雷诺·杜兰德著,牛文生、程艳、江波译,海洋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)就是以全新的视角展示海洋生物的读物。尽管介绍海洋生物的图书出了不少,但是这本厚重的画册与众不同,它是一部纪录片副产品,由著名导演雅克·贝汉会同一批科学家、摄影师、技术专家组成的团队,历经4年,跑遍了地球各个纬度、各具特色的海区,实地追踪各种海洋生物的珍贵实录。

书中有一幅占两页的世界地图,标明摄制组在世界各海区的拍摄点,特别注明在该点拍摄的重点对象,如在加拿大巴芬湾拍北极熊、独角鲸和海象,在南极洲拍帝企鹅和威德尔海豹,在非洲南部海区拍大白鲨、南非鳐鱼和沙丁鱼、真海豚,等等。

从整体结构来说,该书包含三部分内容。第一部分是大海的居民,包括大白鲨、澳大利亚巨型乌贼、毯子章鱼、海鬣蜥、驼背鲸、瓦尔德斯海豹、帝企鹅、蓝鲸等珍稀海洋生物,这是本书的重中之重。第二部分是“海洋的未来怎样”,涉及很多令人深思的海洋环境和生态保护问题。第三部分题为“电影拍摄”,详细介绍了拍摄这部大型纪录片的方方面面,既有各种水下摄影的技术、装备,也有潜水的特技,以及拍摄过程的花絮。

限于篇幅,这里仅简要提及几种有趣的海洋生物。一种是众所周知的帝企鹅,南极洲冰雪世界的代表性生物。为了不惊吓企鹅,水下摄影师不得不冒着严寒,从小冰窟中潜入水中,或躲在冰山后面,用镜头拍下它们在海中觅食的情景,以及在风雪酷暑中育雏的过程。观察发现,雄企鹅在孵化企鹅蛋的4个月里不进食,体重会减轻44磅,大约是原体重的一半。“雌企鹅会在8月份归来,为了在企鹅群中找到它的伴侣,它会使用一种特殊的召唤方式……它鸣唱时会立即出现两个频率,产生特殊的旋律,对每只企鹅而言这种旋律都是独一无二的,它们以此来寻找伴侣。”

在非洲罗巴岛海滩上拍摄绿海龟,也有一些有趣的发现:刚孵出来的小海龟,其性别是由巢穴温度决定的。如果巢穴温度在84华氏度以上(约30摄氏度),小海龟大部分是雌性;如果巢穴温度在84华氏度以下,小海龟大部分是雄性。可想而知,全球气候变暖,将会改变海龟的性别比例,从而引起爬行动物的生存危机。另外,科学家对海龟异乎寻常的方向感也很感兴趣:海龟们一旦进入大海,每年都会跋涉几千海里,到高纬度海区度过它们的欢乐时光,然后又千里迢迢返回故乡产卵,从来不会迷路。

在海洋生物的食物链中,处于最底层的是微小的浮游生物,它们分布在从远海到近岸,从极带到热带,几乎无处不在。但是浮游生物中也有大型的。日本的越前海域,有一种越前水母,也叫野村水母,直径6.5英尺,重达485磅,是目前已知的最大的水母之一,它的触须对大多数海洋生物都是致命的。

当然,随着摄制组的活动范围遍及各个海区,他们在不断收获惊喜的同时,也一次次伴随着心灵的震撼和困惑,不由得“望洋兴叹”吧!海洋的未来不容乐观,人类过度的商业捕捞,已经造成许多大型鱼类的急剧减少甚至消失,许多物种在科学家尚未来得及发现和、研究之前已经濒临灭绝。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。

书中有一幅世界地图,标明摄制组在各海区的拍摄点。奇怪的是,不知什么原因,我国沿海辽阔海区没有一个观测点。这个遗憾,看来有待中国海洋学家去填补空白了。

我很想看一看这部电影,相信一定是很震撼的!



《迁徙的鸟》《微观世界》雅克·贝汉·贝内特,《海洋》萨雷诺·杜兰德著,牛文生、程艳、江波译,海洋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

神秘的海洋生物世界

■金涛

时代远离了文学,或是文学远离了时代?

■陈华文



《文人的贵族精神:熊召政文化访谈录》,熊召政著,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8年8月出版

阅读推广人

长期以来,作家这个群体一直受到广泛关注。这是因为作家不仅创作文学作品,还通过作品的思想、观念影响芸芸众生。可是近年来,伴随着文化活动的多样化和多元化,尤其是网络进入生活后,作家和作品似乎被冷落了、边缘化了。另外,作家作为文人的代表,其内部也出现了分化。作家该如何面对新的时代?又该如何进行写作?这些问题,作家熊召政有着系列的思考,这些年来,在全国各地不同场合,他以演讲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。读《文人的贵族精神:熊召政文化访谈录》,给人能带来诸多启迪。

很多人可能认为,熊召政仅凭长篇历史小说《张居正》,2002年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。殊不知,早在

1973年他还是一个下田干活的知青,靠长诗《献给祖国的歌》已经在文坛初露头角。随后在1979年,26岁的他又创作长诗《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,制止!》,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诗人。功成名就之后,他却投奔商海。这样因为,他想体验不同的生活。上世纪90年代,他已经是有钱的商人,又突然回归文学,花费5年时间潜心研究明史,又花5年功夫创作长篇历史小说《张居正》。一个人的经历,往往会给写作带来深刻的影响。熊召政是一个颇有时代感、有责任心的作家,他认为作家既然无法选择时代,就应该拥抱时代,在沸腾的生活中书写文学的篇章。他的故事、他的经历、他的主张,贯穿在这本演讲集中。

《文人的贵族精神:熊召政文化访谈录》一书中,收录的演讲文字稿,均是首次出版。全书共分为三辑,共有19篇演讲稿组成。第一辑主要讲文人,第二辑讲对文化、生命等问题的感悟,第三辑以楚文化为主题,讲地区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差异性。书名中的贵族精神,并非物质生活的大富大贵,而是说作为文人的作家们,精神和灵魂要高贵,人要有脊梁骨,不应该被世俗的名利诱惑,更不能与恶俗和肮脏为伍。

作家的即兴演讲,容不得虚伪和矫情,因为台下的听众可不是傻瓜。本书中的一篇篇演讲稿,保留着“讲话”的原汁原味,读一行行文字,就如同熊召政就在眼前与自己对话。对于生态环境问题,熊召政极为关心。在他看来,这不仅是社会治理的事情,同样也是文学与文化的命题。在第一篇演讲稿《重建诗意生活》中,集中呈现出他对这个热点的见解。改革开放以来,很多大城市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,城市生活给人们带来便捷,可是很多现象也不能忽略,如广袤国土上萎缩的森林、污染的河流、污浊的空气等,成为制约美好生活的要素。

熊召政认为,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成熟,有两个显著的标志:一是充满爱心,二是心存敬畏。处理社会与自然的关系,要有所为有所不为,过度向自然界索取资源,迟早会遭到自然的报复。遏制人类的贪欲,重建诗意生活才有可能。而对于诗意生活,他讲道:“诗意生活对应的不是物欲横流,也不是人定胜天,而是人与自然的相亲相爱。”有关人与自然的,以及诗意生活的价值主张,古人早就提出“天人合一”的理念,但是这一理念在历代并没有真正贯穿在人们的行动中。越是接近现

代,生态环境破坏就愈发严重。对此,熊召政深表遗憾。

作家该以怎样的态度写作?这直接关乎作品的品质和成色,这无疑是一个严肃的文学话题。在熊召政看来,写作不是为了消遣,更不是为了孤芳自赏。他在题为《作家的责任》的演讲中,进行了厚重的阐述。上世纪80年代,是全民热爱文学的年代,作家是全社会的焦点人物,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在亿万群众中广泛传播。对此,他很怀念文学的“黄金时代”。但是,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。在他看来,作家不能总是留恋过去,要立足当下,紧跟时代,紧贴生活。这个时代,有人觉得严肃的文学离人们渐行渐远,到底是时代疏远了文学,还是文学疏远了时代?他提醒作家们:文学其实永远驻扎在人们的心中,不是人们不爱文学,而是文学没有真正砥砺人心。

有人以为,作家发声的最好方式就是写出好作品,对此笔者并无异议。但是作为有影响力的作家,除了会写、能写,还要会“说”,以演讲的方式,直接表达对文学、对社会、对时代的看法,或许更能砥砺人心。熊召政在不同的演讲中,思想的电光、智慧的花火、创作的灵感其实在竞相迸发。

阅读推广人

◎熊召政,中国当代著名作家、诗人、学者,茅盾文学奖获得者,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。已出版长篇历史小说、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历史札记、诗集40余部。
◎文学评论家、武汉大学教授樊星认为:“熊召政的散文关注历史人文,行文古香古色。文风有士大夫气息,在当代作家中也不多见,符合当下学术文化界对白话典雅化的期待。”